

# 福利国家模式、职业结构与不平等原因

袁富华<sup>1,2</sup>, 吴湛<sup>1,2</sup>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福特主义工业社会向后福特主义服务经济的转变, 赋予各类福利国家诸多新特征。从职业分层来看, 经济服务化过程中大量专业岗位的创造及其对熟练技能的需求, 使得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政策, 越来越成为推动阶层流动的决定力量。从收入分布来看, 全球化、去管制化、去工业化与老龄化、经济服务化、城市化的叠加, 使得福利国家模式普遍呈现出收入极化或不平等, 中产衰退的迹象也比较明显。效率公平权衡的努力, 进一步加剧了福利国家模式分化。鉴于高度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困难和挑战, 产业均衡发展, 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协调, 构成稳妥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福利国家; 职业结构; 机会公平; 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23)01-0093-13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23.01.009

## 一、引言

劳动力不充分流动所导致的职业分层及其不平等, 一直是社会理论的关注重心。基于阶级图示或职业分类量表, 本文对于福利国家不平等的模式化机制给出了分析。观点是, 去管制化、去工业化和经济服务化, 加剧了当代经济社会的不平等, 具体如下: 第一, 当代围绕福利制度建立起来的职业分层, 得益于福特主义带来的生产和管理革命。现代公司制度、规模化生产体系、集体谈判机制以及国家福利体制等, 都在职业阶层化过程中发挥着过滤器的功能, 制度安排的差异导致福利国家模式的多样性。三类福利国家模式的阶层化特征是: 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对市场效率的重视, 以不平等为代价; 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对社会公平的重视, 以财政膨胀为代价; 社团主义福利国家对等级秩序的重视, 以压低服务业就业为代价。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秩序和不平等模式化的基本轮廓。第二, 福特主义向后工业化时代的转型, 或者说传统福利国家向积极福利国家的转型, 对原有相对公平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冲击。全球化、去管制化、去工业化叠加到老龄化、经济服务化和城市化上, 使得几乎所有福利国家模式

**收稿日期:**2022-12-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20AJL004)

**作者简介:**袁富华,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经济学博士, 主要从事经济增长理论、经济社会学研究; 吴湛,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本文吸收了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 特此致谢。

出现了收入分布的极化或者“U形反转”,中产衰退的迹象似乎也比较普遍。从收入分布及其变化来看,去工业化总体上不利于中产阶层的稳定。第三,福利国家理论着重于职业岗位变化的分析,提供了另一种有启发性的视角。这种主要基于职业分类而非收入分布的视角,旨在强调以下事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工业化时代,推动了服务经济新业态的快速成长,大量专业、准专业和熟练服务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去工业化”流失的技能岗位。显然,这个视角提示了如下重要问题——在存在职业界限的情况下,教育以及更加广义的社会政策,为突破阶层闭合或阶层固化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决定动力。原因在于,不同于传统福利国家中非熟练职业对于工会保护的依赖,更加开放的后工业化时代对于能力和资质提出了较高要求。第四,去管制化应该理解为管制方向和形式的变化,而不是放弃管制。服务经济中人力资本重要作用的凸显,要求国家担负起必要的保障和规范责任,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平衡,关系到城市化时期效率—福利动态平衡的维持。中国大规模工业化极大促进了就业结构升级和国民收入稳定增长,但是,现阶段发生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也遇到了类似于福利国家那样的“去工业化”和收入不平等,权衡效率与公平相应成为中国服务经济的重要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共同富裕战略的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

## 二、福利国家不平原因与平等观念的评述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阶级分类和不平等原因研究的深入,一些更具有理论意义的社会分层评价方法开发出来。我们首先从社会不平等产生的一般因果机制谈起。根据巴林顿·摩尔的文献,社会不平等产生的一般因果机制大致分为两类,即源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不平等和源于社会活动的不平等。具体地:(1)年龄和性别所引致的不平等的事实,一直存在于各种形式社会之中。即使在现代社会,虽然制度创造的不平等占据着显著位置,但是,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不平等仍然具有很大影响。如何维持老年人的“最低体面”生活、如何完善女性的职业生涯,困扰着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政策。(2)文明发展过程中由社会活动和制度安排造成的不平等,包括以下几类:第一,出于社会协作需要而产生的“命令—服从”关系<sup>[1]119-143</sup>。正如社会功能论的诠释那样<sup>[2]29-30</sup>,社会是由不同等级及相应功能构成的有机体,人们各得其所。第二,对于未知事件解释权的控制、对于威胁的控制所产生的权威和声望。典型如早期宗教阶层和军队阶层的特权。第三,生产和分配过程中产生的占有、剥削和控制。这种不平等通常表现为统治阶级对于剩余价值的榨取,以及市场经济中垄断力量对产品和价格的控制。第四,劳动分工和专业化造成的职业收入水平的差异。这是现代社会不平等创造及其维持的主要因素,职业分层由社会需求和集体偏好决定,并因此形成了相应声望系统。第五,基于家庭的社会再生产。正如一些研究指出的那样,通过复制阶级和阶级关系,家庭在决定个人社会位置方面具有重要作用<sup>[3]135</sup>。(3)不平等原因的上述分析,包含了阶层分析的三个要素:功能主义的(命令—服从)、生产关系的(占有、剥削和控制)、市场关系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80年代以来兴起的阶级分析——尤其是针对福利国家职业结构分析,对此提供了更加具体的分析线索。

### (一) 职业分类与阶级图示

与巴林顿·摩尔的观点类似,克朗普顿(2011)把不平等归因于人类活动的结果,并在综述各种测量方法的基础上,将阶级或阶层的概念归纳为三类:<sup>①</sup>第一,作为声望、地位、文化或者生活方式的“阶级”;第二,与经济和权力资源占有相关的、经济社会不平等的“阶级”;第三,作为潜在的或实际的社会和政治行动者的“阶级”<sup>[3]13,26,85-86</sup>。通常认为,阶层(或社会分层)是一种包括了阶级的更加广义的概

<sup>①</sup>福利国家理论中使用的阶层、阶层化或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概念,比“阶级”概念含义更加广泛。

念,对于诸如年龄和性别、文化和惯习、种族和地区等非阶级因素引起的不平等,应该在阶层的意义上理解。根据侧重点不同,基于职业聚类的社会分层评价方式有三类,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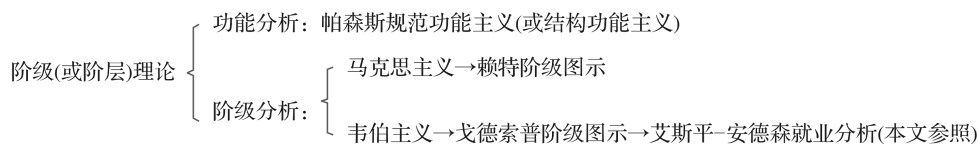


图1 阶级理论与阶级分析脉络

资料来源:克朗普顿(2011)<sup>[3]</sup>,Parsons(1940)<sup>[4]</sup>,Esping-Andersen(1993)<sup>[5]</sup>。

1. 描述性的职业阶级图示。这种根据声望、技能和报酬进行职业排序的等级图示尽管产生较早,但是,人们习惯于将帕森斯(Parsons,1940)规范功能主义作为它的理论依据,即强调阶层化的社会团结、社会整合功能。正如戴维斯和威尔伯特·摩尔所说的那样,最重要的职位由最合适的人来担任,声望、技能和报酬的制度化不平等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sup>[6]</sup>。

2. 理论性的职业阶级图示。这种根据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和市场关系)进行职业分类的方法,认为静态功能分析忽视了社会冲突以及阶级形成原因,通过将雇佣关系嵌入就业分类形成了两个理论图示,它们主导了20世纪80—90年代的阶级分析:其一,赖特围绕生产关系建立起来的职业分类图示,旨在对一些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命题进行检验,典型如布雷弗曼(1978)提出的福特主义发展过程的“去技能化”或“无产阶级化”<sup>[7]362,380</sup>。其二,戈德索普围绕市场关系建立起来的职业分类图示,是一种依据生活机会的分类方法,促进阶层化的生活机会包括收入水平、工作条件、发展机会、职业流动等。就像克朗普顿评论的那样,尽管两个理论图示遵从了不同的阶级定义,但是,在职业聚类的分析方法以及阶级形成机制上,却有着广泛的相似之处。

3. 统计应用中的阶级量表。现实中的职业聚类由声望等级与雇佣关系叠加形成,赖特和戈德索普对于描述性图示的反对及其对于理论性图示的坚持,主要是分析上的。实际操作中的职业分类一般需要根据统计便利和具体任务进行,因此,阶级量表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较早把职业分类应用于人口普查的英国,长期以来使用的是描述性的职业等级图示,直到21世纪初,原有方法才被国家统计局社会经济分类(ONS-SEC)取代,新分类从戈德索普阶级图示演变而来,基于雇佣关系而非技能水平。不同于ONS-SEC,起先受到英国人口普查分类标准影响并不断完善的“职业分类国际标准(ISCO)”,最终围绕技能水平和功能分层确立。按照艾斯平-安德森的研究方法,本文在关注理论性阶级图示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同时,在涉及定量分析的地方采用ISCO提供的数据。

## (二) 福利国家的公平正义与不平等改进机制

不论职业分类方式如何,其目的都在于为不平等改进提供一些线索和启示。特别是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制定方面,有必要把数据分析与平等理论联系起来作为辨识依据。福利制度合理性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两类——分配范式和能力范式:

1. 分配范式中,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阶级图示强调两个方面,即职位开放带来的机会公平、经济效率提高带来的弱势群体处境改善<sup>[8]5-6</sup>。①这种图示本质上是静态的且着重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整合,但是,就其对再分配的重视这一点上,足以成为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2. 能力范式对于怎样获取机会公平给出了进一步论证,这种动态的、注重民主参与的过程分析,

①分配与占有相联系;规则、权利、程序与行动的社会过程相联系,这些因素决定了人们参与决策的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对于分配范式局限的深刻反思与批评,请参见艾丽斯·杨(2017),作者提出的取代分配范式的“宰制—压迫理论”,可视为政治意义的“能力范式”,与森的经济意义上的“能力范式”在分析方法上类似<sup>[9]24,28-29</sup>。

在很多方面与理论性阶级图示类似。森(2002)认为贫困与不平等源于能力剥夺,典型如:医疗和福利供给不足,将会导致生存能力低下(预期寿命短、营养不良);教育提供不足,将会导致就业能力低下,这些剥夺都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这类观点重视市场和社会政策在人的发展方面的重要功能,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决策民主对于社会包容的重要作用<sup>[10]98</sup>。能力范式对于福利国家制度改革产生了较大影响,如,英国政府最近的一份政策评估,把“平等社会”重新定义为促进机会公平、尊重个人选择和个人发展、消除人们选择的障碍<sup>[11]</sup>。这种范式的局限在于,实践中往往被自由主义者以机会公平为借口忽视再分配的作用。

### (三) 社会分层、职业结构与福利国家模式

根据艾斯平-安德森的观点,福利国家理论明确将广义罗尔斯原则作为论证依据,倡导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参与和能力发展,优先将社会包容和减少不平等作为增强经济竞争力的基本组成部分<sup>[12]xvii,9</sup>。显然,广义罗尔斯原则可以视为分配范式和能力范式的综合,并且进一步将两种范式的社会政策内涵通过“育幼—入学—就业—养老”的生命历程公式呈现出来。当然,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较为引人注目的一种模式分析,福利国家理论对于社会分层有着独特见解。正如艾斯平-安德森在其经典著述中所说的那样,福利国家自身就是围绕公民的社会权利建立起来的阶层化体系,根据社会政策对于就业支持的不同安排,不同国家的阶层化机制分化为自由主义福利国家模式、社团主义福利国家模式和社会民主福利国家模式<sup>[13]</sup>。

1. 不平等模式化机制分析方面。艾弗森和雷恩将其概括为服务经济的“三难困境”——财政收支平衡、收入平等和就业增长三个目标只能取其二,亦即: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以市场不平等为代价,换取财政收支平衡和私营部门的就业增长;社团主义福利国家以抑制就业增长为代价,换取财政收支平衡和收入平等;社会民主福利国家以放松财政约束为代价,换取就业增长和收入平等<sup>[12]185-187[14]</sup>。这种权衡的不同模式,反映了福利国家经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或者说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或后工业化)的转型,涉及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1)就转型趋势而言,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确立起来的各种福利国家模式,是适应福特主义工业化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一度有助于充分就业和社会公平的实现。80年代以来,随着“去工业化”过程的开启,服务经济的发展再次成为不平等的主要原因。(2)就转型动力而言,经济服务化和新自由主义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工会的社会整合能力。个体化和新自由主义观念的盛行也对赖特和戈德索普的阶级图示提出了质疑,正如沃特斯所说的那样,尽管“阶级终结”的观点有些绝对,但是应该看到经济服务化过程中消费、文化、生活方式等非阶级因素对于福利国家阶层化的影响<sup>[15]</sup>。①这种观点再次把我们拉回到本文开头的一些说明,接下来的分析将使用较为广义的阶层概念,当然,这也是福利国家理论所默许的。

2. 职业结构分析方面。艾斯平-安德森采用了理论性阶级图示的一些思路,特别是戈德索普“生活机会”或职业生涯在阶层化中的作用。对于阶层化这个动态问题,艾斯平-安德森的关注点集中于后福特主义的服务经济和职业结构,并得出一些启发性认识,扼要提示如下<sup>[5]</sup>:②与早期工业化比较起来,二战后福特主义的特色在于调节制度的建立完善,包括作为福特主义核心构件的福利国家、工资的集体谈判机制以及现代公司制度等,它们在职业阶层化过程中发挥着过滤器的功能,并塑造了形态各异的福利国家模式。就后福特主义时代服务经济的就业聚合而言,三类福利国家模式因其“制度过滤器”的不同功能而呈现出不同的职业分层<sup>[5]35-36,232-241</sup>:第一,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如挪威、瑞典的福利制度

①沃特斯的这篇文献,提供了阶级分析理论进展尤其是当今文化转向之于社会分层影响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②与生命历程方法论所包含的更加广泛的问题相对应,艾斯平-安德森的数据处理实际上基于广义的阶层概念,如家庭贫困、教育、老年贫困、女性就业等非阶级因素在福利国家理论往往受到格外关注。这种关注也体现在作者其他诸多研究中。此处征引的一些主要观点,详见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 1993)<sup>[5]</sup>。

都有支持集体服务的传统,服务部门就业一方面得益于国家的培训规划,另一方面得益于公共部门提供的大量机会,而工资谈判政策也有助于收入平等的维持。总体来看,这种模式促进了非熟练人员就业,低职业阶层有着较好的向上流动机会。第二,自由主义福利国家鼓励市场机制,公共政策对私人部门的支持较多,对于充分就业和集体社会服务的支持较少。这类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英国)通常缺乏系统的培训体系,服务业扩张虽然吸收了大量非熟练劳动力,但是低工资、低技能阻断了这些劳动力的上升通道,导致显著的不平等。第三,社团主义福利国家中,教育与就业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如,德国劳动市场刚性就与其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有关,入职的依据是文凭和证书,熟练工人拥有良好的向上流动的机会。这种资质主义的阶层化机制虽然有助于降低职业极化,但也抑制了服务业就业的增加。

3. 有待继续验证的艾斯平-安德森的主要观点。第一,从职业分类而不是(像其他研究那样)从收入角度审视“中产衰落(declining-middle)”的乐观预期是,在后工业化时代,三类福利国家模式均呈现出中高端职业快速增加的趋势,低端职业的份额相对下降。因此,当代职业分层中的“去技能化”不明显。第二,“无产阶级化”和职业极化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存在,那种低收入、低技能的职业阶层闭合,在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阶层化过程中可能比较明显。第三,福特主义职业和后工业职业的较低层次(低技能服务、操作岗位),充当着劳动力流动调配器的功能,既为年轻人开始职业生涯提供了暂时的栖身之所,也为失业者再就业提供了生活机会。这些判断支持了早期研究揭示的阶层化和职业流动规律。<sup>①</sup>第四,教育在促进低层次职业流动和生活机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专业学位的有限供给将会导致高端职业阶层的闭合。

### 三、福利国家模式、职业结构与不平等状况的评估

以20世纪80年代福利国家改革为分野,缔造了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传统福特主义开始转向后福特主义。去工业化、工会力量的削弱以及未来收入稳定增长预期的下降,导致后工业化时代阶层化机制的重建,于是,新的职业分层与不平等源于教育、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所导致的生活机会的差异。<sup>②</sup>正是为了突出这种新特征,艾斯平-安德森将后工业化时代的职业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务农职业;第二类是福特主义职业(管理者、文书、销售、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第三类是后工业职业(专业人员、半专业人员、熟练服务人员、非熟练服务人员)。基于这种分类,艾斯平-安德森将性别嵌入职业分层中,并认为当代职业分层的主要特征是男性主导着第二类职业、女性主导着第三类职业,由此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分析视角。为了对已有观点在最近30年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同时为了对福利国家理论主要依据职业分类得出的乐观看法进行修正,本部分提供了三组测算数据:(1)为了补充艾斯平-安德森没有展开的收入分布不平等分析,本部分首先测算了1970—2020年间主要福利国家的工资分布分位数比值,同时作为已有“U形反转”观点在当代有效性的检验。(2)参照艾斯平-安德森的职业分类,本部分对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职业和产业分类重新归并(表4、表5、表6),以此为基础对1995年和2020年的产业就业和职业结构给出了测算,同时以艾斯平-安德森的较早数据为基准进行比对,以

<sup>①</sup>请参见布劳和邓肯(2019)的观点:白领—蓝领—农业的分层中,两个最低的白领群体(文书人员、销售人员)和三个最低的蓝领群体(服务人员、制造业体力工人、其他行业体力工人)可视为流出、流入的调节器,既是更低出身人员向上流动的通道,也是更高出身人员向下流动的避难所<sup>[16]59-60</sup>。

<sup>②</sup>显然,这种观点受到布尔迪厄(2017)的影响:一个群体可能拥有的占有某个等级稀缺财产的机会,依靠这个群体的特定占有能力,这种能力是由这个群体利用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社交关系、声望和尊严的资本)决定的<sup>[17]200</sup>。

检验其观点在当代的有效性。限于篇幅,1995年的一些主要数据在注释中列示。(3)作为对“U形反转”观点的回应,同时作为对艾斯平-安德森观点的修正,本部分提供了基于职业量表的工资分布不平等数据。

### (一) “去工业化”“去管制化”与“U形反转”:阶层化趋势之一

基于美国全部劳动者工资收入不平等状况(自然对数方差)的考察,哈里森和布鲁斯通识别出一种“U形反转(Great U-Turn)”趋势: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不平等快速持续下降;70年代末期之后,美国的不平等转为快速持续上升。不仅如此,通过对底端分位收入均值与顶端分位收入均值的比较,他们发现这种“U形反转”现象还出现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甚至像瑞典那样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不平等持续改善的趋势也在70年代末期之后终止。与上文艾斯平-安德森的视角不同,哈里森和布鲁斯通更多关注职业分层所导致的工资率日益分散这个更具实质性的问题<sup>[18]</sup>。新自由化浪潮中发生的不平等加剧,更多出于结构变动而非短期波动因素的影响,具体地:

1. 去工业化。早期研究将制造业部门就业下降视为结构失衡所致,按照辛格的观点,有效的制造业应该有助于维持贸易平衡、增长和充分就业之间的良性循环<sup>[19]</sup>。去工业化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如下:第一,根据鲍莫尔模型,<sup>①</sup>由于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普遍慢于制造业,因此,低技能服务业工资向制造业看齐将会导致成本病(如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和社团主义福利国家)。但是,如果遵从市场机制放任低技能、低工资服务业发展,将会出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中的就业极化。第二,传统福特主义的制造业中,工会力量在工资谈判和利润分享中起着重要作用,结果是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后工业化时代的服务经济中,服务业异质性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sup>[20]</sup>。同时,工会力量的削弱也加剧了整个职业分层不平等的扩大。

2. 灵活专业化。二战后黄金时代的福特主义及其福利国家模式,由于过度积累导致利润率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持续下降,原有组织方式的潜力耗竭。面对这种困难,灵活专业化的制度被引入生产组织并导致收入不平等扩大。例如,数量灵活性——管理者重新设计工作,用兼职、合同和其他“临时”工人代替全职、“常规”劳动力,管理者外包生产、维护、餐饮、文书等工作,这种做法加剧了劳动市场细分,从而加剧工资分散。工资灵活性——管理者尽力促使劳动力“再商品化”,以降低工会力量对工资形成的影响以及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这种做法加剧了工资不平等。

3. 去管制化与低生产率陷阱。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去管制化”和工会力量的削弱,进一步将“去工业化”和制度改革的成本转移到弱势群体身上。面对经济萧条和失业压力,边缘企业往往以压低工资的方式获得利润,低工资连同工会谈判力量的缺失使得这些企业失去创新动力,最终进入“低生产率—低工资”循环<sup>[21]</sup>。当然,在社会保护和劳动力市场规制不完美的国家,这种恶性循环导致的不平等更加常见。

参照哈里森和布鲁斯通关于20世纪60—80年代美国、英国、瑞典“U形反转”的识别方法,图2给出了三类福利国家收入不平等状况在最近时期的变化。以下几点值得注意:(1)工资分布的极化现象出现在所有国家。从工资分位数顶端与底端比值(D9/D1)来看,80年代以来的去工业化、去管制化以及经济服务化的发展,使得收入不平等在各种福利国家模式中广泛存在,哈里森和布鲁斯通对“U形反转”的识别在最近30年依然有效。<sup>②</sup>(2)极化问题最严重的是那些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特别是新自由主

<sup>①</sup>请参见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 1993)<sup>[5]</sup><sup>10</sup>。

<sup>②</sup>法国和意大利的可得数据较短,图2没有显示,附注如下:(i) D9/D1(2002年、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法国(2.9、2.8、2.8、2.8、2.9),意大利(2.5、2.7、2.6、2.6、2.6);(ii) D9/D5(1980年、1991年、2002年、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法国(1.9、2.0、2.0、1.9、1.9、1.9、1.9),意大利(1.5、1.5、1.7、1.8、1.8、1.8、1.8);(iii) D5/D1(1980年、1991年、2002年、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法国(1.7、1.6、1.5、1.5、1.4、1.5、1.5),意大利(1.8、1.6、1.4、1.5、1.5、1.4、1.4)。

义政治最为流行的美国;极化问题最为缓和的是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工会力量和政府对于服务业部门就业的支持抑制了工资不平等;社团主义福利国家的极化现象居于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之间。极化现象的这种“模式”特征,符合福利国家理论的一般认识。(3)中产衰退(declining-middle)迹象普遍存在。哈里森和布鲁斯通运用美国工资份额分布识别出的“中产衰退”,在图2也有所体现,就工资分位比较而言:(甲)高端分位持续大于中间分位(D9/D5)——或者说高阶层收入与中产阶层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现象,(乙)中间分位趋近于低端分位(D5/D1)——或者说中产阶层收入与低阶层收入差距持续减小的现象,显著存在于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社团主义福利国家虽然不是那么显著,但是中产衰退趋势在最近十多年也有所表现。即使考虑到社会民主国家那种比较公平和稳定的模式,我们似乎仍然可以认为,新自由主义和经济服务化,实质上并没有改善中产阶层的状况<sup>[2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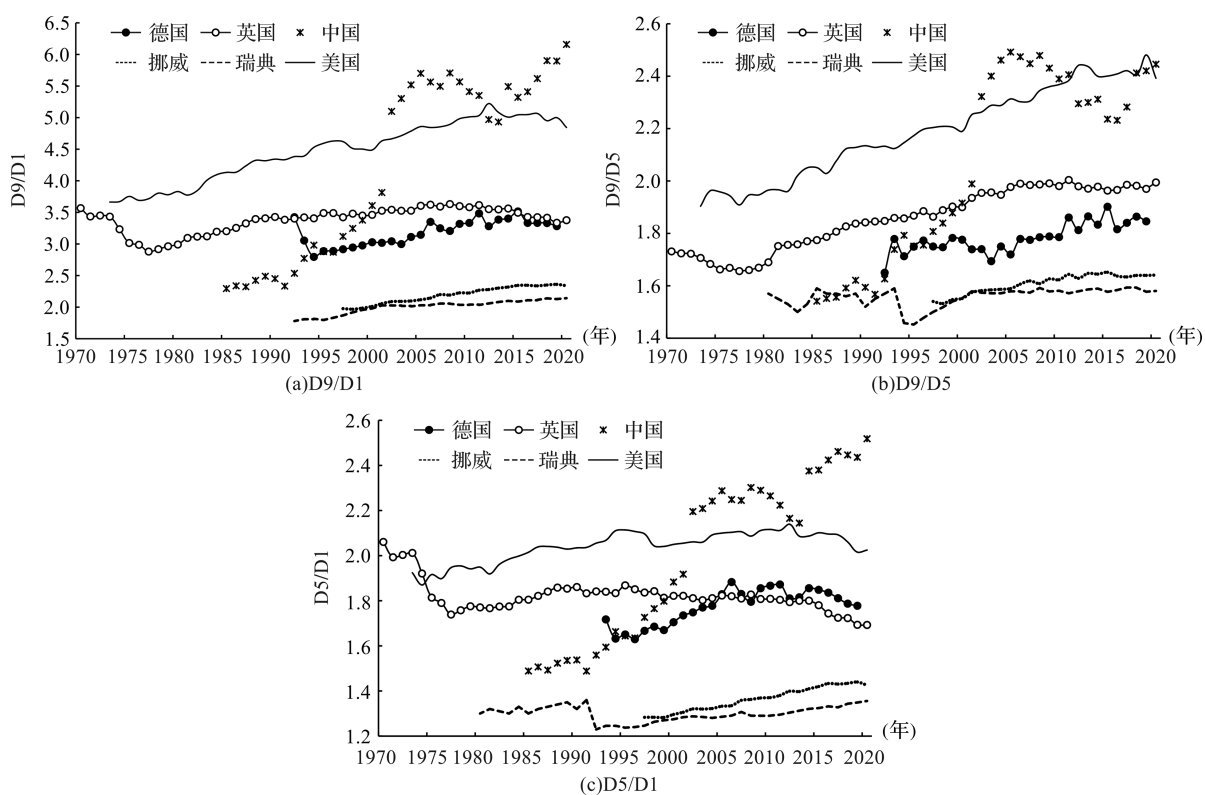


图2 1970—2020年间各国工资分布的分位数比值

资料来源:OECD数据库。<sup>①</sup>

## (二) 后工业化时代的就业分布与再技能化: 阶层化趋势之二

上述不平等状况是基于三类福利国家模式收入分布而言的,在做出这个简要展示之后,现在转入就业聚合趋势及其问题分析。参照艾斯平-安德森对于福利国家模式的职业分层方法<sup>[5]</sup>,本部分运用国际劳工组织(ILO)职业和产业数据,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分层趋势给出一些说明(艾斯平-安德森

<sup>①</sup>由于数据来源不同,中国数据与外国数据存在口径差异。OECD数据库中的D1、D5、D9是其劳动市场中全职雇员的总收入(非可支配收入)分布的十分位数,而中国数据来自城镇住户居民调查,报告的是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及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不提供收入分布的分位数值,而是将样本根据收入等级分组后,分别提供各组的组内平均值,因此本文采取组内平均值估算组中值,作为D1、D5、D9的替代指标。鉴于统计口径变化,1985—1999年的指标依据各分组人均年收入计算,2000—2020年的指标依据各分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计算。

的样本期是20世纪60—80年代)。产业和职业分类的必要说明如下:(1)按照艾斯平-安德森的归类,产业分为三个部门:初级部门(农、林、牧、渔业);福特主义部门(工业、流通与政府),即以大规模生产与大众消费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后工业或后福特主义部门(生产服务业、社会服务业与消费服务业),即二战后由经济社会变革诱发的新业态(表1)。此外,艾斯平-安德森还将初级部门、工业和流通行业统称为“传统经济”。(2)与产业分类平行的职业分类。产业分类的基本统计单位是企业或工厂,以其产品、服务划分行业归属;职业分类的基本统计单位是个人,着重描述工人的技能等级、职业等级和社会地位。与产业分类相对应,艾斯平-安德森将职业划分为三类:初级职业、福特主义职业、后工业职业(表2、表3)。此外,在福特主义职业和后工业职业中存在等级划分:福特主义职业阶梯中,管理者属于顶层,文员、销售、技术工人属于中层,非熟练工人属于底层;后工业职业阶梯中,专业人员属于顶层,半专业人员、技能服务人员属于中层,非熟练服务人员属于底层。

1. 就业的产业分布。如前文所述,艾斯平-安德森对于产业或职业再分类的目的,主要是想证明从传统福特主义时代转向后福特主义时代的过程中,“去工业化”不一定导致去技能化和收入极化,因为后工业化过程中的新业态有助于服务业的发展,那些行业恰是女性就业、年轻人就业和失业者再就业所需要的。艾斯平-安德森基于职业分层(而非收入分布)的分析视角,与其福利国家理论中蕴含的广义罗尔斯假设有关,即重视机会、技能和教育之于公平的必要性。但是也需要认识到,他的方法的局限也是明显的:由于没有把工资分布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单纯从职业变动来推断收入极化问题,得出的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

表1(a)征引艾斯平-安德森的1960年产业分类数据作为基准,与2020年的数据进行比对,这个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演化所引致的后工业化结果是引人注目的。传统经济就业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快速下降,而生产、消费、社会服务业比重则一路走高,两者的比例关系在90年代以后发生逆转。根据艾斯平-安德森提供的其他相关数据以及本文的估算,这种逆转趋势的持续加速发生在80年代之后,亦即新自由主义政治兴起和后福特主义发生时期。<sup>①</sup>表1(b)所显示的2020年的就业分布状况,可视为艾斯平-安德森“制度过滤器”长期作用或“三难困境”的平衡结果。如,美国的服务业就业比重虽然表现出北欧国家那样的高比重(64%),但是,一个是以不平等为代价在自由主义福利制度中取得的,另一个是以鲍莫尔成本病为代价在普遍主义福利制度中取得的。社团主义国家——典型如德国,生产、消费和社会服务业比重相对较低,显然是其就业资质的严格要求所致。

表1(a) 1960年各国就业的产业分布(%)

	德国	挪威	瑞典	英国	美国
初级部门	14	21	14	3	7
工业	49	33	42	44	35
流通	19	26	20	21	23
传统经济(小计)	81	80	77	68	66
政府部门(小计)	5	4	3	6	5
生产服务	3	2	3	6	6
社会服务	5	6	9	11	11
消费服务	6	7	8	9	11
后工业服务业(小计)	14	15	20	27	27

资料来源:Esping-Andersen(1993)<sup>[5]37-39</sup>。德国为原西德数据,英国为1971年数据。

<sup>①</sup>限于篇幅,此处未显示与表4(b)结构一致的1995年数据表。1995年的传统经济(小计)、政府部门(小计)、后工业服务业(小计)分别为(%):法国(44、10、46);德国(49、10、41);意大利(53、10、38)。艾斯平-安德森提供的80年代的相应数据为:德国(65、8、26);挪威(58、7、36);瑞典(54、7、39);英国(62、10、29);美国(51、12、44)。



表1(b) 2020年各国就业的产业分布(%)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挪威	瑞典	英国	美国
初级部门	2	1	4	2	2	1	2
工业	12	20	19	10	10	10	10
流通	18	17	19	18	16	17	19
传统经济(小计)	32	39	42	30	27	28	31
政府部门(小计)	11	10	7	7	8	8	5
生产服务	21	19	20	22	24	25	25
社会服务	26	24	18	34	32	28	28
消费服务	10	9	13	8	9	12	11
后工业服务业(小计)	58	52	51	63	64	64	64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原始数据取自国际劳工组织(ILO)。

2. 就业的职业分布。与表1的产业结构变动状况类似,表2所示的职业分布在后工业化时代也出现了逆转趋势。表2(a)征引艾斯平-安德森的1960年职业分类数据作为基准,与2020年的职业分类数据进行比对,主要是为了验证艾斯平-安德森关于后工业化时代并未加剧“去技能化”的判断。单纯从职业分布的结果来看,经济服务化过程诱致的新业态成长及其相应“再技能化”趋势比较显著,在这点上,艾斯平-安德森的判断是对的。

表2(a) 1960年各国就业的职业分布(%)

	德国	挪威	瑞典	英国	美国
初级职业(小计)	14	20	14	3	7
管理者	3	3	5	9	8
文员	15	10	9	17	16
销售	8	8	7	6	7
熟练工人	25	11	19	15	13
非熟练工人	16	26	22	26	22
福特主义职业(小计)	67	58	61	73	66
专业人员	3	3	3	5	5
半专业人员	5	5	9	7	6
熟练服务	2	4	4	3	4
非熟练服务	9	8	10	10	12
后工业职业(小计)	18	20	25	24	28

资料来源:同表4(a)。

从三个小类(小计)所占比重来看,“后工业职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快速提升,进入21世纪之后继续提高并最终超过初级职业和福特主义职业的加总。<sup>①</sup>重要的是三个小类分别包含的职业细分数据在2020年的表现,扼要提示如表2(b)、表2(c):(1)总体趋势是,“后工业职业”提供了专业、半专业和熟练岗位,从而有助于缓和“去工业化”可能导致的去技能化。即使在传统福特主义部门,非熟练职业比重在长期中也呈现显著下降趋势,这种趋势与各国普遍重视教育和技能的总体环境有关。(2)与

<sup>①</sup>限于篇幅,此处未显示与表2(b)结构一致的1995年数据表。1995年的初级职业(小计)、福特主义职业(小计)、后工业职业(小计)分别为(%):法国(5,54,41);德国(2,58,40);意大利(4,59,37)。艾斯平-安德森提供的80年代的相应数据为:德国(5,68,27);挪威(8,56,37);瑞典(4,50,43);英国(3,68,30);美国(3,61,36)。

产业就业分类的模式化机制类似,社团主义国家——典型如德国,后工业职业比重相对较低、熟练工人比重相对高、产业工人(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的减少相对轻微。社会民主国家的后工业化程度更高,但非熟练服务职业的比重相对较小,倾向于专业、半专业人员群体的扩大。美国与英国的后工业化程度略低于挪威和瑞典,后工业职业分布相对均匀。(3)表2(c)是对“去技能化”的一个补充说明,从趋势来看,非熟练服务人员相对于专业人员的比值是下降的,这在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和社团主义福利国家比较显著。

表2(b) 2020年各国就业的职业分布(%)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挪威	瑞典	英国	美国
初级职业(小计)	3	1	2	1	1	1	0.4
管理者	8	4	4	9	6	12	12
文员	4	8	7	3	3	4	3
销售	6	7	8	7	5	6	7
熟练工人	17	20	21	16	17	12	13
非熟练工人	7	6	7	5	5	5	6
福特主义职业(小计)	42	45	46	40	36	39	40
专业人员	20	21	16	30	31	27	23
半专业人员	12	12	10	10	11	8	13
熟练服务	13	12	15	17	15	17	13
非熟练服务	9	7	11	2	4	8	10
后工业职业(小计)	55	54	52	59	62	60	59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原始数据取自国际劳工组织(ILO)。英国为2019年数据。

表2(c) 职业阶梯的底层与顶层人数比值(%)\*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挪威	瑞典	英国	美国
福特主义职业							
20世纪90年代	1.4	1.3	3.0	0.8	2.3	0.6	
21世纪	1.2	1.3	1.0	1.1	2.1	0.5	0.7
21世纪10年代	1.0	1.4	1.9	0.8	1.2	0.5	0.6
2020年	0.9	1.4	1.9	0.6	0.8		0.5
后工业职业							
20世纪90年代	0.7	0.7	1.0	0.8	0.3	0.6	
21世纪	0.7	0.5	1.0	0.4	0.3	0.8	0.4
21世纪10年代	0.6	0.5	0.8	0.1	0.2	0.4	0.4
2020年	0.4	0.4	0.7	0.1	0.1		0.4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原始数据取自国际劳工组织(ILO)。\*福特主义职业阶梯比值:“非熟练工人”与“管理者”的人数比值;后工业职业阶梯比值:“非熟练服务”与“专业人员”的人数比值。鉴于数据可得性,各年代取其中某一年作为代表。

### (三) 收入不平等:阶层化趋势之三

作为艾斯平-安德森职业分类分析的补充,同时也是作为“U形反转”的回应,这里运用收入份额数据,给收入不平等和中产衰退观点提供一些佐证。我们依据各个职业层级的平均月工资,对各个职业层级工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给出了估算,大致勾勒出了收入的职业分布。为清晰起见,表3提供了各个职业阶层收入比重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除德国与意大利(处于中间阶层的)熟练工人和服务工作者的收入份额有所提升外,各国收入分配均向高层职业(管理者,专业人员)倾斜,这种现象一方面

表明了高层与底层群体的收入差距的极化趋势,另一方面表明了中间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在收入而非职业流动的意义上,中产衰退的迹象普遍出现在了各国近些年的社会分层中。

表3 各国职业层级所占收入比重的变化(%)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挪威	瑞典	英国	美国
	ISCO-08	2005— 2020年	2005— 2018年	2007— 2019年	2005— 2020年	2005— 2020年	2005— 2019年	2005— 2020年
1	管理者	2.0	-0.5	-6.9	1.8	-0.7	-3.8	1.4
2	专业人员	10.2	3.9	5.6	16.5	11.4	15.6	3.7
3	技术员及辅助专业人员	-0.2	1.3	-3.0	-9.4	-1.9	-2.0	1.1
4	文书工作人员	-4.2	-0.2	1.7	-1.6	-2.6	-4.1	-2.0
5	服务工作者、销售人员	0.5	1.5	4.5	-0.3	0.8	0.1	-1.5
6	熟练的农、林、牧、渔工作者	-0.9	-0.4	0.3	-0.3	-0.2	0.1	0.0
7	工艺品及相关贸易工作者	-3.4	-3.4	-2.4	-3.3	-1.0	-1.4	-2.7
8	工厂和机械操作员、装配人员	-2.6	-1.9	-1.2	-2.8	-4.8	-1.6	-1.0
9	初级职业	-1.4	-0.3	1.4	-0.6	-1.0	-2.9	1.0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原始数据取自国际劳工组织(ILO)。

#### 四、结论与延伸讨论:对中国共同富裕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并没有为经济低迷和社会公平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就像服务经济“三难困境”所表述的那样,发达国家为了应对去管制化、全球化和老龄化所带来的新风险,不得不在维持各自福利制度传统基础上,实行渐进式的改革与利益平衡<sup>[23]</sup>。实际上,即使像美国那样的自由主义福利国家,最近40年来用于社会保护的支出份额不降反升,英国在90年代中期也重新认识到工人法律保护和社会伙伴关系的重要性。面对这种变化,一些研究者认为应该纠正“去管制化”一词的误导性,应将其理解为管制方向和形式的变化,而不是放弃管制<sup>[24]66</sup>。就阶层化和不平等这个主题而言,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之于中国共同富裕战略有以下几点启示:

1. 效率赖以持续改善的阶层化图景。回顾图2,中国的收入分布呈现出了比较显著的极化趋势,不仅表现为高层对于中低阶层,而且表现为中层对低阶层。从各类福利国家的经验来看,福特主义作为一种利润分享机制及其相对公平社会环境,主要源于“政府—工会—雇主”三方力量的妥协,黄金时期的效率—福利动态平衡的建立,本质上是利益相关各方政治博弈的结果,因此不能简单归结为经济规律。比较而言,自由化政治导致了不平等的上升,这在美国尤为明显。启示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权衡仍然应该作为制度建设重中之重,在当前收入分布极化已经比较突出的情况下,放任市场的作用只会恶化经济增长的环境。因此,共同富裕不仅要求市场活力,而且要求稳定的社会秩序。出于效率—福利动态平衡路径构建的需要,城市化时期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提供市场规范和社会保护,在促进市场开放和机会平等的同时,为劳动力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和社会保障。

2. 教育和社会流动。就像一些重要的阶层化分析所揭示的那样,在白领与蓝领、蓝领与务农之间存在两个指示向上流动的界限;也就是说,白领的低层级和蓝领的低层级分别充当着人员流动的调节器。但是,在打破阶层界限并推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教育起着决定性作用。并且,鉴于白领阶层“晕轮效应”的影响,白领光环的外围,往往遍布那些收入低、技能含量低的非体力岗位<sup>[25]81-89</sup>,因此,这个当今的社会主导群体自身质量也需要教育给予支持。启示是,中国抓住了福利国家产业转移的机遇,现代部门需求扩张的拉力以及剩余劳动力供给的推力,推动了过去40年的劳动力流动,主要特征是实现

了农业劳动力向非熟练工人职业、非熟练服务职业的短距阶层跨越。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及技能要求的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大量劳动力,仍然面临质量升级和跨越阶层界限的压力,教育均等化相应成为需要国家大力支持的现代化领域。<sup>①</sup>福利国家理论强调的机会和技能,是实现向上流动的必要条件。为了适应服务经济知识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城市化时期的一个重要任务,应该立足于提升劳动力素质,核心在于围绕生命历程完善促进人力资本和社会流动的措施,重点是以国家的大力支持提升教育培训的体系化、可及性与均等化。

3. 产业均衡发展。“U形反转”和“去工业化”命题,一般蕴含着不利于生产率提高和收入公平的担忧。且不管福利国家理论的态度如何,就中国城市化和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前景而言,认真对待脱实向虚的问题很有必要。需要注意一个重要的全球化背景,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兴起,在经济上表现为金融化主导的全球化,这种趋势对于国内的影响,就是实体经济的过早衰退以及建立在债务扩张基础上的金融化发展。无论从未来可能出现的贸易失衡问题(回顾辛格的著名论述)来看,还是从财政可持续来看,抑或是从金融化加剧社会不平等来看,失去制造业基础的城市化前景是暗淡的和不确定的,更不用说不平等状况改善了。从产业发展现状来看,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无论是就业质量还是经济效率,中国与福利国家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发达国家服务经济的较高质量,中国服务业效率和收入整体较低的问题仍然存在,服务业就业难以提供较为稳定的收入公平的基础。在转型时期,稳定制造业部门规模、提升制造业质量,仍然是抑制收入不平等的重要途径。

#### 参考文献:

- [1] MOORE B. Moral Aspec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Other Essays[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9-143.
- [2] 理查德·托尼. 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M]. 沈汉,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9-30.
- [3] 罗丝玛丽·克朗普顿. 阶级与分层[M]. 陈光金,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3,26,85-86,135.
- [4] PARSONS T.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40, 45(6):841-862.
- [5] ESPING-ANDERSEN G. Changing Classes: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M]. London: Sage, 1993: 35-39, 232-241.
- [6] DAVIS K, MOORE W E. 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5, 10(2):242-249.
- [7] 哈里·布雷弗曼. 劳动与垄断资本[M]. 方生,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362,380.
- [8] 约翰·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M]. 万俊人,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5-6.
- [9] 艾丽斯·杨. 正义与差异政治[M]. 李诚予,刘靖子,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24,28-29.
- [10] 阿玛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 任贇,于真,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98.
- [11] HMSO. Fairness and Freedom: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Equalities Review[R]. London: HMSO, 2007.
- [12] ESPING-ANDERSEN G, GALLIE D, HEMERIJCK A, et al. Why We Need a New Welfare Stat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185-187.
- [13] ESPING-ANDERSEN G.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4] IVERSEN T, WREN A. Equality, Employment, and Budgetary Restraint: The Trilemma of the Service Economy[J]. World Politics, 1998, 50(4):507-546.
- [15] WATERS M. Succession in the Stratification System: A Contribution to the Death of Class Debate[J].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994, 9(3):295-312.
- [16] 彼得·布劳,奥蒂斯·邓肯. 美国的职业结构[M]. 李国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59-60.
- [17] 皮埃尔·布尔迪厄.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M]. 刘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00.

<sup>①</sup>关于中国学者对于分层和流动研究的系统综述,请参见李春玲(2019)<sup>[25]</sup>。

- [18] HARRISON B, BLUESTONE B. Wage Polarisation in the US and the “Flexibility” Debate[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0, 14(3): 351–373.
- [19] SINGH A. UK Industry and the World Economy: A Case of De-industrialisation? [M]. New York: Springer US, 1977: 183–214.
- [20] BELL L A, FREEMAN R B. The Causes of Increasing Interindustry Wage Disper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1991, 44(2): 275–287.
- [21] DEAKIN S, WILKINSON F. Labour Law,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Inequality[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5(2): 125–148.
- [22] 袁富华, 吴湛. 福利国家模式、增长悖论与再平衡[J]. *学术研究*, 2022(6): 85–95.
- [23] 保罗·皮尔逊. 拆散福利国家: 里根、撒切尔和紧缩政治学[M]. 舒绍福, 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2007.
- [24] 理查德·海曼. 解析欧洲工会运动[M]. 吴建平, 译.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5: 66.
- [25] 李春玲. 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 70 年[J]. *社会学研究*, 2019(6): 81–89.

## Welfare-State Regimes, Occupational Structure and Causes to Inequality

YUAN Fuhua<sup>1,2</sup>, WU Zhan<sup>1,2</sup>

(1.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Fordist industrial society to the post-Fordist service society, many new characteristics emerged in the welfare states. In terms of occupational stratification, the emergence of great number of professional jobs in the process of servitization as well as its demand for skilled workers had made education and other social policie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decisive forces for class mo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globalization, deregulation, deindustrialization combined with the composite issues of aging, servit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have led to polarized or uneve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almost all welfare states, and the middle class declined generally. Efforts aimed at balancing efficiency and equity magnified the divergence of welfare states. In the light of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pursuit of modernization, balanc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are the cornerstone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welfare states; occupational structure; equal opportunity; common prosperity



(责任编辑 孙 豪)